·西域文化研究·

# 两汉时期西域风物东传探略

朱　丽

摘　要　汉朝与西域开始官方的正式往来，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在两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汉王朝与西域在政治上的诉求，维护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上的关系，而且西域风物也大量东传，带动了两地的交往，其中包括以动物、植物、矿物和工艺品为主的实体性风物，也包括宗教、音乐舞蹈以及魔术杂技为主的非实体性风物，对于丰富内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两汉　西域　风物

## 引　言

连接中西方的古丝绸之路贯穿西域全境，使得西域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汇的重要场所。自西汉起，我国历朝历代的中央和地方政权通过派遣官吏、屯田等方式经营西域，对西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开始正式经营西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所以两汉时期对西域的经营在历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在西域与汉王朝之间保持着良好政治关系的同时，西域风物也大量东传，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内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风物”一词既包括实体性风物，又包括非实体性风物，因此其产生的作用及影响也是不同的。该文旨在考察两汉时期西域风物东传的背景与内容，并反映其影响价值，这对研究西域及内地的民族关系、民生状况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域，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往今来，对于西域进行研究的著作颇多。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汉书·匈奴传》及《后汉书·西域传》等书中，都对汉王朝经营西域有详细描述。政治上的经略会带动经济上的发展，值此，在很多著作中都对西域的风物进行了描述。[①]述及了两汉时期西域的香料、胶水、葡萄酒等实体性风物以及宗教、音乐等非实体性风物的东传。但归结起来，对于两汉时期西域风物东传情况的描述大多都是附带性论述时产生的，随意性强，即使有对风物东传进行详细描述的文章，也只是对其中的某一类进行考察。迄今为止，对于两汉时期西域风物东传的情况做出综合性考察的文章还没有出现，故该文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求拾遗补缺，对风物东传做综合性论述，也希望能够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获。

## 一、历史背景

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强盛。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增，人民富足，国库殷实。此时，汉武帝想要改变过去被动的局面，做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的决定，故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与西域进行官方正式交往即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政治目的虽未实现，但是在西行的过程中，其对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所以在汉匈交战需要战马之时，其为武帝提供了西域诸国盛产良马的信息[②]。之后，西域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来往络绎不绝。公元前 60 年，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公元 45 年，西域诸国遣子入侍，请求汉王朝派遣西域都护[③]。由此可见，通过汉王朝对西域的多年经营，到东汉王朝时，西域诸国在自身已经能够对汉王朝的经营表示认同。后因班超战绩颇丰，故被任命经营西域[④]。在汉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西域诸国已与中原王

朝建立了一种互利互信的关系。汉王朝欲借西域诸国之力“断匈奴右臂”,而西域诸国则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汉王朝的庇护,于是向中原王朝贡献大量奇珍异宝,这种政治上的推力,也大大加快了西域风物的东传。

二、风物东传

两汉时期,西域传入内地的不仅有实体性风物,还有非实体性风物。实体性风物主要有动物、植物、矿物和工艺品等,带动了内地农业、畜牧业和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而非实体性风物主要包括宗教、音乐舞蹈以及魔术杂技等,促进了内地文化艺术的繁荣。

(一)实体性风物东传。

1. 动物

西域传入内地的动物种类很多,以马、牛、羊、狮子等居多,其中尤以马和狮子的东传最为典型。

(1)马

在研究马的诸篇文章[⑤]中,对于大宛的汗血马有诸多考察。此处旨在论述马匹(含汗血马)的东传及意义,就不再单独对汗血马进行过多论述。

汉朝很早就通过礼赠、互市和战争三种途径从西域获得马匹[⑥]。马匹的东传有其重要意义,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到了西域之马促进了两地的交流。如其云: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从表面上看是因“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但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汉武帝对马的喜爱却与抗击匈奴有着直接关系。武帝时期,汉匈交战,为了达到训练骑兵之目的,对于马匹的需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西域马匹的东来,无疑提高了汉王朝对匈奴的作战力。以大宛的汗血马为导火索,引发了大宛之役。通过此役,汉王朝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宝马,提高了汉朝在西域的声望[⑦]。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汉和西域诸国的交流,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马匹的东传。同时,从这场由马匹而引起的数年之久的战争来看,汗血马作为西域的独特品种不仅引起了汉王朝极大的兴趣,而且对汉武帝开边兴利起着重要作用[⑧]。对此,汉武帝还专门对大宛马作诗,可见其对大宛马的评价甚高。

此外,马匹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匈奴同汉和亲[⑨]的时候,也是向汉朝献马。而乌孙为与汉结盟,也曾“以马千匹为聘礼献汉”,可见马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匹的东传不仅增强了汉朝的军事力量,改良了中原地区马的品种,促进了内地养马业的发展壮大,而且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劳动条件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石云涛提到马与汉代交通息息相关,驿站在汉代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而在《居延汉简》中对驿马也多有提及,贵族往往驾马车出行。这充分说明马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不仅为人们节省了时间,而且也被看成了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

(2)狮子

狮子,俗称百兽之王。《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狮子、符拔”;“章和二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符拔”。西域诸国向汉王朝贡献狮子,从侧面反映了汉朝的强大,暗喻了汉王朝的唯我独尊。此外,还恰好迎合了上层统治者的心理[⑩]。狮子的东传,也与佛教息息相关[⑪]。正如释迦牟尼在佛教经典中被称为“狮子吼”,因此,在当时来说狮子也成为了一种佛教的象征。

据刘自兵先生在《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一文中所载,当狮子传入内地之后,内地人民便把狮子当做一种看守门户的吉祥物。认为其可避邪纳吉。所以最早的时候是用石狮子来镇守陵墓,它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灵兽,也被称作“避邪”。这充分体现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与此同时,古代在诸多地方也用石狮子守门,以显示主人的权势和尊贵。此刻,石狮子便又起到了彰显权贵的作用。由此可见,石狮子在古代建筑中作为装饰物,起到了一种体现人们盼望和平安乐的强烈愿望的作用。这种影响被传承下来,正如享誉中外的卢沟桥以石狮子而出名,内地人民会在大门口放置石狮子一样。狮子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持久深远的影响,足以看出是在其传入内地之后,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于

佛教之外而存在的狮子文化。狮子的形象在剪纸、纺织、刺绣中也多有体现。此外，人们还通过传统的狮子舞来展现一种英勇无畏、乐观的品质。以上所述可在相关著述中得到印证⑫。由此可见，狮子的东传，不仅在贵族生活中有所体现，对于丰富民间文化也有重要意义。

2. 植物

根据考古资料记载，在公元前 10 世纪以前，西域最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就已经产生了。虽然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南北疆的农业经济依旧发展得很快。众所周知，在西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农作物的东传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来了大量农作物的种子。其中主要有苜蓿、葡萄、胡麻和大蒜等，增加了西汉时期物种的品种种类。其中对内地较有影响力的当属葡萄和苜蓿。

（1）葡萄

葡萄，旧称“蒲陶”。西域盛产葡萄⑬。两汉时期，西域的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学会了用葡萄酿制葡萄酒的技艺，且有人开始珍藏葡萄酒。葡萄酒在酿酒业中作为一种新增的种类，当内地与西域进行经济交流时就自然引起内地人民的兴趣。武帝时期，葡萄遍种于离宫旁，但葡萄酒的酿造技艺传入内地的时间与葡萄相比却较晚。直到东汉末期，内地可能已经能够酿制葡萄酒了⑭。所以葡萄种传入内地之后，葡萄酒的酿制方法随后也传入了内地，所加工出的葡萄酒更是得到了内地人民的喜爱。虽然当时大面积种植葡萄，但是产量却很少，因此葡萄在当时仅供达官贵族享用，所以才有了《后汉书》中所记载的“扶风孟他以葡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的事情。

葡萄作为酿酒业中的新种类，在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之外，还产生了特有的葡萄文化。即葡萄开始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发挥其独特作用——装饰。其在汉代制作的铜镜和织锦中多有出现⑮。用葡萄作为装饰的东西，造型精巧，工艺华美，在汉代十分盛行。由上可知，葡萄的东传，为内地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为人们的审美注入了新的活力。

（2）苜蓿

“兵以马为本，马以食为命”。⑯前面已经提到汉匈交战需要大量的战马，而汉武帝也从西域获得了诸多良马。此刻，解决喂养马匹所需的草料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汉通西域之后，汉使带来了苜蓿种，马喜食苜蓿，而汉朝的马匹数量十分巨大。于是天子始种苜蓿于离宫旁，极望焉。⑰这样不仅解决了马匹的草料问题，也保证了汉军后方的安定，为汉军攻打匈奴，经营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苜蓿东传，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⑱在今天，苜蓿的作用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牲畜而言，苜蓿可以作为草料，主要以一种优质牧草被栽培；但是对人类而言，由于苜蓿具有丰富的营养，所以其可食，⑲同样可以作为一种菜品来享用，在现代生活中，涌现了苜蓿凉菜和苜蓿饺子等美味。

3. 其他

西域的实体性风物除了以上所论述的动植物传入了内地，还有其他一些实体性风物也传入了内地。《后汉书·西域传》言：“土（天竺）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⑳可见，西域独特之物众多。诸国为了和汉朝建立友好的关系，也常常各自献上本国特有而汉朝还不曾有或者数量很少的奇珍异宝来沟通两国的关系，西域所特有的风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内地，引起了内地人民极大的兴趣。

（1）香料㉑

《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指出：西域的胡椒、姜、乳香、苏合香、安息香等香料也相继传入了内地。其中胡椒、姜和乳香都可作为调料入味，尤以乳香应用极广，又可用于熏香、照明和缓解疼痛；苏合香可清热解痛，对于开窍醒脑效果显著；安息香以安息国命名，此后一直未改其名，所以推测安息香在汉朝时就传入了内地。此说也印证了《博物志》中所载的有使者在武帝时期向汉朝进贡香料，但是香料的样子却没什么特别，武帝只是将其收了起来，直到发生疫病，点燃此香，才防止了疫病的蔓延，说明这种香料还有药用的功效。

香料的东传，带动了香具的发展，例如熏香炉、香囊、香枕等。当时已经产生的熏香传统，主要反映在王公贵族之中，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香料和香具㉒。考古资料表明，此次出土的香料和香具数量

大，种类多，说明香料的使用在汉代初期已成了一种习俗。香料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同样带动了香料制作技艺的发展。

（2）毛织品

在毛织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地毯。地毯，在汉朝时期被称为氍毹。曾有文章[23]提到汉代的乐府诗中对地毯曾有“请客北堂上，做客毡氍毹”的描写。说明两汉时期地毯在传入内地之后，并未广泛使用，只是用来招待宾客的贵重物品。在《北堂书钞》中也有记载，班固曾托班超为窦宪购买闟登（毛织毯、地毯之类）。可见当时中原使用西域的毛织品还只是达官贵人的特权，他们对其甚是喜爱，并以此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毛织品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使汉王朝的等级界限更加明显。

（二）非实体性风物。

西域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凭借其实体风物深深地吸引了内地人民，其非物质文化，例如宗教、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也得到了内地人民的青睐，在中原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1. 佛教

据《魏书·释老志》[24]记载两汉时期佛教传入内地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霍去病征讨匈奴，昆邪王率众投降之时，向武帝献上金人，但当时只是烧香礼拜，并不祭祀，这是佛教最初传入内地。二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内地知道有佛教一说，此为听说阶段。三是哀帝时期，此刻，佛教已经开始发展。主要表现为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口授佛经。四是孝明帝夜梦金人[25]。当被告知金人为佛时，遂派遣使者向西域求佛法。此后，佛教正式向内地传播，直至桓帝之后开始兴盛起来，大量佛经开始翻译发行。当时豪华装饰的佛塔，也成为了后来各地建造佛塔的模式。佛教的东传，不仅为内地增添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也为内地人民找寻了另外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为统治者维护统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同时也突出说明了两汉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值得后世瞩目。

2. 音乐舞蹈艺术

两汉时期，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十分鼎盛，传入内地之后，对内地的歌舞产生了重要影响。

（1）音乐和乐器

两汉时期，音乐和乐器不断传入内地。汉高祖酷爱长江流域的楚地音乐，但是其在西域音乐的影响下也与宠妃作于阗乐[26]。通过此种方式来娱乐、放松自己。这充分说明西域的音乐已走上了宫廷的舞台。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了西域的大型套曲“摩诃兜勒”。李延年是西汉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他能够推陈出新创作出新的乐曲。其根据“摩诃兜勒”重新创作了 28 部乐曲[27]。新的乐曲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喜爱，同时也为内地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和繁荣了内地音乐艺术的发展。当然，与音乐艺术密不可分的乐器也是不可缺少的，从现存的石窟壁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西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笛等等。

《隋书·音乐志》云：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箜篌，是一种弹拨乐器，主要分为卧箜篌和竖箜篌。《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指出：出土的诸多石刻中，以竖箜篌的形象居多，而竖箜篌于东汉时传入内地，受到了内地人民的欢迎，东汉作曲家曾经创作了《箜篌引》。据记载[28]竖箜篌有二十二弦，需“竖抱于怀中，用双手齐奏”，灵帝很喜爱，致使“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成为了风靡京都上层社会的乐器。

除了箜篌之外，还有笛子，据《中西文化交流史》载，笛子最初与羌密不可分，所以又被称为羌笛，后来在武帝时期被改进，因其源于西域的横吹，不同于中原原有的笛子，所以又被称为胡笛。其声音动听，在东汉后期，流行于中原地区，深受内地人民的喜爱，对我国古代的横吹和单管乐器产生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29]。据《汉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影响》一文所载，自此之后，华夏系统的竹笛也采用了和胡笛一样的排孔，即吹孔和按音孔在同一平面，并因其演奏方法而衍生出了“胡吹”一词。这些西域乐器传入内地，不仅丰富了内地的乐曲和乐器，也对内地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2）舞蹈艺术

舞蹈是一种优美的形体艺术。当音乐传入内地之后，舞蹈也随之而来。通过查阅资料，可明显看出西域舞蹈与音乐的东传记录相比，其记录相对较少，在汉灵帝身上可见一斑。《后汉书·五行志》曾记载灵帝喜爱胡箜篌、胡笛、胡舞等。可见，西域

的舞蹈此时已传入了宫廷,为以汉灵帝为首的皇室所喜爱。西域的舞蹈传入内地,使内地温柔婉约的舞蹈融入了西域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舞蹈文化的变革,也为内地的舞蹈艺术增添了新的魅力,从而对内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3. 魔术杂技

"眩人",又叫做"幻人",是汉代对魔术、杂技表演者的统称。《史记·大宛列传》曾记载"(安息)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轩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説"[30]。他们不仅能自缚自解,还能口中吐火,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魔术。杂技,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由传统的角抵戏,发展成了节目众多的"百戏"。其中主要包括走索、倒立、扛鼎、缘杆等[31]。魔术杂技的东传,引起了中原人民极大的兴趣,促进了汉代百戏体系的形成。东传初期,魔术杂技只在宫廷中表演,此后在民间开始兴盛,吸引大量观众,起到了娱乐大众的作用,也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大地提高了内地人民的表演艺术创作水平,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丰富了民间文化,使民间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 三、影响价值

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西域风物通过朝贡、互市甚至战争的途径大量进入中原,不管是流传于世的书籍还是僧人在丝路上的往来活动,都在民族及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域风物东传,使内地的各族同胞对西域的风土人情有一个大致了解,增加了内地物种的种类,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与发展,充实并改善了内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可见,西域诸国与西汉政府在政治上的交往推动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也使西域与内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两汉时期西域风物的东传,不仅使西域各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也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各民族关系的发展。就民族关系而言,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不是疏远,而是更紧密,交往更密切了,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更加有利。前文所论述的有关两汉时期西域风物东传的内容及影响,有力地说明了文化的交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不论是实体性文化还是非实体性文化,都对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内地人民多姿多彩的生活,也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晋〕张华:《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59、61、66、69、132、165 页;〔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175 ~ 225 页;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47 ~ 76 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1 年,20 ~ 50 页;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61 ~ 106 页;〔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23 ~ 25 页。

②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3174 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2909 页。

④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1572 页。

⑤侯丕勋:《汗血马诸问题考述》,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2);刘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马"揭秘—兼说中国家畜家禽阉割传统》,载《敦煌学辑刊》,2008 年,(2);周士琦:《汗血马小考》,载《文史杂谈》,2002 年,(2)。

⑥石云涛:《汉代良马的输入及其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7)。

⑦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3177 页。

⑧何平立:《略论西汉马政与骑兵》,载《军事历史研究》,1995 年,(2)。

⑨〔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3755 页。

⑩李桥江:《古道上的狮子和香料》,载《新疆人文地理》,2015 年,(3)。

⑪刘自兵:《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载《东南文化》,2008 年,(3)。

⑫林移刚:《汉族民俗中的狮子形象及其内涵》,载《艺术百家》,2012 年,(7)。

⑬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6 页。

⑭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3160 ~ 3162 页。


(下转第 64 页)

新疆烈士传 第一辑 [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26~28.

[11] 张源生. 抗日战争时期在喀什工作的共产党员(续)·胡鉴英名留西陲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喀什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C]. 喀什:《喀什日报》社印刷厂,1988年:41.

[12] 吴珍. 新疆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J]. 兵团党校论坛,1995年,第4期:13.

[13] 段文波,郭瑞民,董江芸. 战车团长战车团——记我军装甲兵首次进疆 [J]. 中国档案,2010年,第8期:22~23.

[14] 胡鉴. 米字旗的降落——帕米尔高原上的一次反帝斗争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7.

[15] 三十年代末期活跃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共产党员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喀什市文史资料 第一辑 [C]. 喀什:《喀什日报》印刷厂,1986年:23~24.

[16] 任鼎亭. 帕米尔高原上的反帝斗争——回忆30年代末蒲犁边务办事处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隐蔽的战线 第十九辑 [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79.

[17] 任鼎亭. 帕米尔高原上的反帝斗争——回忆30年代末蒲犁边务办事处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隐蔽的战线 第十九辑 [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79.

[18] 胡鉴. 抗战时期的新疆蒲犁边卡大队 [A]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 [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46.

[19] 胡鉴. 抗战时期的新疆蒲犁边卡大队 [A]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 [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47.

[20] 洪佳师,米尔扎依·杜斯买买提.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展概况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9.

[21] 张源生. 抗日战争时期在喀什工作的共产党员(续)·廉洁奉公的好县长——许亮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喀什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C]. 喀什:《喀什日报》社印刷厂,1988年:46.

[22] 房若愚,葛丰交. 塔吉克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J]. 新疆社科论坛,2006年,第3期:94.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接第52页)

⑮张玉忠:《葡萄及葡萄酒的东传》,载《农业考古》,1984年,(2)。

⑯㉛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3页。

⑰胡之:《甘肃敦煌汉简》,重庆出版社,2008年,15页。

⑱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895页。

⑲孙启忠:《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载《草业学报》,2016年,(1)。

⑳王香祖、席继锋、韩学平:《苜蓿食用价值的研究及运用》,载《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年,(8)。

㉑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921页。本文所提香料均属植物界,但此处旨在突出说明其作为香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㉒王颖竹:《略论秦汉至两宋时期的香料》,载《文物》,2013年,(5)。

㉓张明强:《和田:中国地毯的摇篮》,载《新疆人文地理》,2010年,(4)。

㉔[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3025~3029页。

㉕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923页。

㉖㉙季伟:《汉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影响》,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3)。

㉗[唐]房玄龄:《晋书·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84页。

㉘杜佑:《通典·乐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3669页。

㉚[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890页。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